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别论

郭世佑

Employs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developed from an important modern Chinese social contradiction to analyze concretely the pros and cons of Sun Yatsen's anti－Manchu though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f we do not take the modern－day nationalities policy as a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anti－Manchu propaganda of Sun Yatsen, and if we face squarely the fact that Manchu－Han contradictions seriously obstructed the advance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from an objective historical reality, then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its practice, and the entirety of it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were unmistakable.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某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研究得越多，其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也往往越大。关于近代反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就是如此。倘若我们既不是削足适履式地以时过境迁之后的当代民族政策为坐标，将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对号入座，又不是对暴力革命深怀偏见，而是先正视满汉矛盾严重阻碍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这一客观历史实际，然后具体分析其是非与得失，那么，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必然性与整体上的历史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

一

如所周知，自满族八旗劲旅如汤沃雪直取明朝皇权而入主中原以降，满汉民族矛盾就已十分突出。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或取消国内所存在的满汉矛盾，不过是添上一层中外民族矛盾，使中国的民族矛盾日形复杂而已。双重民族矛盾的存在，堪称中国近代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深深地印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脑海里。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发挥。”[①]孙中山认作实现政治革命之前提与手段的反满口号，就是他紧紧抓住国内满汉矛盾这一重要的国情现象而提出的。面对列强的欺凌步步逼进，得寸进尺，他忧心如焚，试图从反满入手，推翻腐朽清朝，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以达到缓解中外民族矛盾和救国救民的目的。

历史甫入本世纪初年，亦即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不久，孙中山向俄人罗斯基谈到中俄两国革命对象的差异时就说过：“俄国尼可拉斯皇室为斯拉夫本族，无政府党所欲推倒者，极端专制耳。”中国的统治者爱新觉罗氏则是“外族入主中国”，“今中国人民宜推翻者有双重历史，曰外族满清之入主，曰现代政府之腐败，而皆为数千年起大革命历史所允许。”[②]孙中山视满族入关为“外族入主中国”，并不妥当，所述“双重历史”也并非全属历史范畴。“现代政府之腐败”属于现实范畴；“外族满清之入主”，既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不过，满汉矛盾的存在，满族统治者的腐败，两者都是事实，孙中山的分析在整体上并没有错。正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孙中山以苦口婆心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

孙中山作为占中国人口之绝对多数的汉族之一员，他在谈论所谓“外族满清入主”情况时，既说历史，也谈现实，既谈八旗兵曾经屠杀汉人的过去，讲述“扬州十日”，“嘉定屠

城”一类故事，也谈满族贵族压迫汉人的现在。他说：“当入寇之初，屠戮动以全城，搜杀常称旬日，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山泽遗民，仍有余恨，复仇之念，至今未灰。而虏朝常图自保以安反侧，防民之法加密，汉满之界尤严。其施政之策，务以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事事以刀锯绳忠义，以利禄诱奸邪……凡国之所以能存者，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而满人则曰：‘变法维新，汉人之利，满人之害。’又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是犹曰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也。满人忌汉人之深如此矣，又何能期之同心协力，以共济此时艰哉！”③“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④他还谈到清皇朝滥施刑法以压制汉民的情况⑤，建议刘成禺就太平天国反满史事写成专著，“先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⑥。两年之后，刘氏遵嘱完成《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即欣然为之作序，称赞该书“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⑦。

对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孙中山的抨击也是不遗余力。他在1900年上书香港总督卜力时就指出：“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失势则媚，得势则骄，面从心违，交邻惯技，是谓尚诈术。较量强弱，恩可为仇，朝得新欢，夕忘旧好，是谓渎邦交。外和内很，匿怨计嫌，酿祸伏机，屡思报复，是谓嫉外人。上下交征，纵情滥耗，民膏民血，叠剥应需，是谓虐民庶。锻炼党罪，杀戮忠臣，杜绝新机，闭塞言路，是谓仇志士。严刑取供，狱多瘐毙，宁枉毋纵，多杀示威，是谓尚残刑。”⑧在《支那问题真解》一文中，他以民权政治为视角，列举清朝政府“最惨酷重要”之劣迹为“据政府以自利，而非以利民”、“阻止民人物质、思想之进化”、“驭吾人如隶圉，而尽夺一切之平等权及公权”等10端⑨。

倘若仅仅盯住满汉矛盾和清朝一朝来分析和批判源远流长的专制主义，其视野未免偏狭，立论未免肤浅。但孙中山并非如此。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清皇朝的专制主义，还有为期数千年的专制主义。在这一点上，他同梁启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对人们还能亲历而且应予全力反抗的清朝一朝的专制主义有所强调和侧重而已。他指出，自秦始皇嬴政推行专制政策以来，“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政府与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惟其租税无欠则两不过问矣。至满胡以异种入主中原，则政府与人民之隔膜尤甚。”⑩他参与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还宣布：“非惟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⑪其胸怀不可谓不宽阔，其气魄不可谓不雄伟。

清皇朝被迫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后，不少中外人士为之迷惑，多对“新政”寄予厚望，连一度准备同孙中山携手合作、鼓吹“破坏主义”的梁启超也一边批评清政府的“新政”为“伪改革”、“伪维新”⑫，一边指望清皇朝的预备立宪出现实质性的进展。孙中山则不为所动，他以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他认为，“凡是了解中国朝廷，了解包围和影响皇帝的那些人物的，谁都应当知道，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⑬，“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变革”，并非旁人常说的改革或变法，而是暴力革命，以及“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⑭。

孙中山经常为筹划和发动武装起义而奔波着，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象梁启超那样用很多精力去逐条批驳清皇朝的“新政”，但他仍不忘经常提醒国人和国际社会，不要指望清皇朝的“新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它不会获得成功。他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朝代兴衰的规律：“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

亡；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显然，他的这个分析同多数中外史家笔下的结论是一致的。他借此进一步指出：“即使是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侠行为，如果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指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么注定是要失败的。”⑮

如所周知，清皇朝的“新政”是在慈禧为首的当权者一次又一次失去振兴国家良机之后出台的，也是在双手沾满戊戌变法“六君子”之鲜血、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师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开始的。“新政”的政治动员十分有限，信誉颇差，而且财力、人力都困难重重。可谓不改不行，改也未必能明显奏效。以预备立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再分配，它需要清朝统治者向人民做出相应的让步和牺牲，非此不能满足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和新式绅士、新式知识分子乃至新式军人的厚望，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思想敏锐的孙中山深明此义，他不相信慈禧一伙真能在“新政”中舍弃其视同性命一般重要的手中特权。他在清朝宣告预备立宪之前就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洲人谄媚行贿，藉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榨搜刮。”⑯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方案之后，他又及时指出：“近一二年，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彼满虏处此，万不能与风潮相抗拒，而又不能守一成不变之成法，以保子孙帝王之业。乃始下诏维新，以觇汉人之志向；继则公然宣布立宪预备九年之开国会，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稍有眼光者，多能知之。是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无怪其手段之辣矣！”⑰孙中山一边抨击“强权”与“暴力”之下的“亲贵弄权，舞弊营私，官场黑暗，惨无天日”，一边提醒人们：“此等暴行，不但不足以已乱，而且适足以长乱。满虐未尝不知之，最近鉴于民怨之已深，民心之已去，因兼用阴柔政策，以济强硬政策之不及，乃倡君民合治之说，以假立宪相号召；而其实则欲以宪法巩固君权，美其名曰君主立宪，以瞒天下之耳目，则凡种种专制罪恶，都可以假手于宪法以行之。”⑱

孙中山一边为之焦虑，一边想利用“新政”来为自己的革命事业服务。在他看来，“目前清国国势不振，盖其时将尽。近来中国青年多留学日本欧美，人数不断增加。其毕业归国之后，必有位居枢要之地者。彼等必厌恶旧习，而欲发展新生局面，且不免与顽固保守者冲突。基此原因，发现改革之势正在鼓荡，及身可见清王朝崩溃，这是贯彻余多年宿望之秋。所以极有必要在此等学生中注入这些观点”⑲。他还为“新政”中大规模编练成军的新军有可能成为腐朽皇朝的对立面而深感欣慰。他说，他所领导的反清起义在当时还不曾构成对清皇朝的致命威胁，“超过摄政王想象的更大危险来自王朝自身的弊病”，尤其是新军的崛起。“当满洲王朝指望使用这支军队去使政府为人民接受时，这支军队能够颠覆篡位者（指率军入关推翻明皇朝的满族统治者——引者）并压碎他们。在我看来，这样的事即将发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会睡觉。只要一种思想感情在中国军队中鼓动起来，它将使这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去反对政府而不是为它服务。”⑳

孙中山的估计没有错，一年之后的武昌起义就是同盟会会员刘复基等人打入湖北新军推行“抬营主义”的必然结果。孙中山多次宣告：“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㉑，“满族已在衰落和死亡之中”㉒，清皇朝的推翻“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㉓。

关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督抚专权现象，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督抚专权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也注意到了。他说：“湖广总督治内土地十四万余哩，人民五千五百万有奇，两江总督治内土地十五万七千余哩，人民六千五百万有奇，两总督于治内有无限之权，税可自征，兵可自练，已俨然一专制之君主矣……若以李、刘图强之心，凭江湖有为之具，因未尝不可以

发奋为雄，齐驱列国。”[2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1900年筹划惠州起义前夕，曾经通过香港总督卜力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洵出面联络，希望同李鸿章合作，拟趁北方战乱，实行“两广独立”，然后徐图进取。为了“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他甚至还表示：“我并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25]对于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来说，“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在他看来，“多事之秋，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在满洲政府存在期间，应当维持现状。但随着时势的变迁，相信他们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他的另外一层策略性考虑是，他自己即将回国活动，“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26]

当然，孙中山对谋求同李鸿章合作一事并不盲目乐观而孤注一掷。他心里很清楚：“李无理议之念，复无观察大局之眼识，年已垂暮，以名亦非其所深愿，故虽有港督之谏止，当必为李所不容。虽然，是亦大旱之片云也，唯作万一之预想。”[27]及至争取同李合作事不了了之，孙中山又重新调整自己的救国方案，“下决心要倡导革命”，“集中全力计划推翻清朝政府”[28]。

孙中山既是坚定的反清战士，又是赤诚的爱国者。他的反满理由除了基于满族贵族推行压制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政治腐败之外，还因为清皇朝卖国。用陈天华的话说，是因为清皇朝乃“洋人的朝廷”。后者也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

孙中山在1904年公开发表的《驳保皇书》即指出，“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于尽而已……彼满清政府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也。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29]他义愤填膺地说：“自西力东侵以来，中国人不得不卷入国际旋涡。满虏既不能独立自强，又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一遇对外交涉，便觉图穷匕见，失败自是意中事……至于列强不费一兵一弹，只要一纸公文的照会与要求，而满虏则柔顺恭谨，惟命是听，举国防要地的大好军港，拱手而让之外人，这不是满虏的丧心病狂，又何致贻外交上的莫大的奇辱呢！”[30]对于清皇朝所割让的一块块国土，所承担的一宗宗巨额赔款，所承认的一个个西方列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所出卖的关税权、金融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孙中山都看得清清楚楚，都可以在反满演说中源源道来。他告诉海外侨胞：满族统治者“总是受各国人民的束缚，做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日本那些强国的奴隶；而对我们汉人，则凌辱虐待，无微不至，使我们汉人来做他们的奴隶；这样不是变成奴隶中的奴隶吗？”他的结论是：“要谋中国的自由平等，第一步我们要先实行民族革命，来替汉人湔除这‘双重奴隶’的耻辱。”[31]他还说：“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32]“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33]

二

无庸讳言，孙中山的“反满”宣传掺杂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情绪，其用词与语气都充斥着对满族人民的歧视和偏见，影响及于整整一代反清战士。他常称满族人为“满胡”[34]、“满洲鞑子”[35]、“满奴”[36]、“满贼”[37]、“满虏”[38]、“鞑虏”[39]、“清虏”[40]、“胡虏”[41]、“逆胡”[42]、“异族”[43]、“异种”[44]、“外国人”[45]和“从外国来的满族人”[46]，称清帝为“客帝”[47]、“野番”[48]，称清朝为“虏朝”[49]、“异族政府”[50]、“外国政府”[51]，强调“满洲政府”不等于“支那政府”[52]，“大清国”不等于“中华国”[53]，自称汉族为“皇汉”[54]，汉人为“亡国之民”[55]，视主张君主立宪者为“汉奸”[56]，强调“从种性发出来”的民族主义[57]，在1904年重订致公党章程时，他甚至还主张“兴汉复仇”[58]，许多情绪化的过激之词都体现了孙中山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成份，既不科学，也容易伤害那些同样

处于满族贵族专制统治之下的普通满族人民的感情。梁启超曾以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批评同盟会的种族主义情绪，要求多从政治上立论，多注意“数千年民贼”，不要单从种族上立论，只注重两百余年。梁启超的批评意见不乏中肯之处。梁氏对“朝廷”与“国家”所作的概念区分较之孙中山关于“大清国”与“中华国”的 区分要切实和深刻得多。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满族贵族自率军入关以来，一直对汉族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即使在高喊消除满汉畛域的戊戌变法和“新政”期间，也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由此积怨颇深，由满族贵族所制造、扩大和激化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这也是事实。尽管满族贵族曾虚心接受相对先进的汉族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满族的汉化过程，但这并不等于说满汉矛盾就已不复存在，或者就已日趋缓和。满族贵族所制定的许多国策不是旨在尽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是带着弱者的心态，以防范国家基本人口群体汉人为目标，压制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民族牢狱和臣民牢狱，毁坏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在连遭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其防范与压制汉人之心不改，及至曾国藩统帅的湘军骤然崛起，更是变本加厉。

按理说来，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对外战争中所能发挥的威力与能量往往有着相对的优势与便利。遗憾的是，在满族贵族统治下的近代中国始终体现不出这种优势。究其原因，就离不开满族贵族在国内所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接连丧师割地之后，清朝统治者又不思痛改前非，励精图治，而是苟且偷安，麻木不仁，屡屡拒绝改革，这同满族权贵害怕改革，害怕大权旁落的弱者心态也不无关系。显然，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臣民之于抵抗列强入侵的信心和力量，又牵制和阻碍着以“师夷之长技”开其端的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满汉矛盾已经成为中华儿女谋求国家独立与自由幸福的主要障碍，亟待从根本上予以清除。因此，尽管孙中山发出的反满呼声还掺和着相应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应予认真分别和摈弃之，但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言，反满要求本身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况且，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颇有针对性地补充说，民族革命并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革命者并不是恨全体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另外，孙中山也并非局限于满汉矛盾来谈论反满和种族革命的。他之所以坚持反满，不仅因为满族统治者制造了压制汉人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因为他们腐败和卖国。在他看来，要想从根本上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治腐败和卖国行径，就只有以推翻清皇朝作为第一步。为了尽可能发动广大民众投入反清斗争，他就根据满汉矛盾这一基本国情，找到了“反满”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

孙中山在晚年宣讲《三民主义》时就谈道：“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59]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基于暴力反清的重要性，他将反满民族主义列入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之首，而且对反满民族主义宣传得最多、最为详尽和明了。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反清志士主要就是通过接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走向疆场的。相比之下，他们对孙中山关于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宣传印象不深，兴趣也不大。

孙中山高呼排满，并不等于说他只注意了国内满汉矛盾，忽略了中外民族矛盾。有关“双重奴隶”的精彩分析就可以表明，孙中山等人之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双重民族矛盾的理解与把握既不片面，也不肤浅，也恰恰是为着从根本上缓解中外民族矛盾，挽救民族危机，才发起一场盛况空前的反满运动的。他在 1905 年 8 月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就谈到：“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60]在这里，孙中山已经把话说得够明白的了。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只有反满的内容，丝毫不见反帝的条款，同盟会的《对外宣言》等文件还承认“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利益，一体保护”[61]等等，既源于孙中山等人对“国际法”的迷信式理解，又同自身反抗列强的力量不够密切相关，他们并非不懂个中利害关系。章太炎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

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夷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为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62]

较之孙中山的“排满”呼声更为响亮的章太炎的这番内心表白是真实的，也是颇有代表性的。倘若他们在呼喊“排满”的同时，又亮出反帝的旗帜，白纸黑字写进同盟会纲领中，然后在四面出击的战场上勇猛地冲杀开来，也许只会比 1911 年的武汉保卫战败得更惨。类似“扫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口号虽然最能抒发被压迫国家的义愤和斗志，最能鼓舞人心，却又无补于事。写得密密麻麻的《辛丑条约》便是明证。因为历史总是无情的，它并不遵循人类的道德规范。

固然，只有下决心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这是后人从无数先驱者的艰苦奋斗中归纳出来的规律性认识，但这并不完全等于就是先驱者留给后人的失败教训，某些关于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有所不同，前者既源于历史，又往往高于历史。它可以让人们去感受，甚至可以使这种感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物化为行动，却无法通过重复和再现而使人们获得确证。就反帝而言，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它既需要质的突破，也需要量的积累。倘若缺少量的积累，质的突破便无从谈起。也许只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方可渐臻民族独立之理想终点，绝非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孙中山一代人可以一步到位的。正如中国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在 40 年前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的：“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应反帝而不敢反，想反帝而不能反，这是摆在孙中山一代先驱者面前的一种两难抉择，他们的心情并不比后人那恨铁不成钢之类心情好受。几多遗憾，全凭青史论是非。

长期以来，后世研究者往往对孙中山一代人在反帝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大失所望，不是试图理解和说明先人的那份软弱，而是埋怨和谴责他们的软弱，并且把孙中山等人不反帝当作辛亥革命遭到“失败”的原因来总结。这样的总结显然乃史学主体的主观情感与想象所致，同史学客体本身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逻辑关系。

清皇朝丧权辱国，满族贵族统治下的祖国被弄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孙中山把它归结为满人统治的缘故，这固然有欠精当，因为即使是在汉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也将在劫难逃。中华民族所遭遇的近代危机从根本上说来是侵略成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同中国传统落后的小农文明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巨大差距所致，它同“种族”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而问题在于，孙中山的上述反满诉说通俗易懂，不难激起共鸣，化为力量。对于志在推翻腐朽清朝而创建崭新民国的孙中山来说，这就够了。满族贵族既然是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统治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就必然要在孙中山所引导的民主革命洪流面前充当中国君主专制主义的殉葬品，这是逃脱不了的，这种必然性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因为孙中山说过：“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63]其差别顶多是少一个“反满”或“种族革命”的旗号而已。

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满”宣传与行动，已由孙中山的盟友变成论敌的梁启超不懂个中奥妙，大肆予以批驳。梁氏的同调杨度却能略识玄机。杨度提醒梁启超：“今之民主立宪党，……必不能更有真正之民族主义，特不过取此以为一手段耳。其所以必取民族主义为其手段者，实由其以民主主义为其目的之故。欲行共和政治共同选举之法，则不能不取蒙回藏之人而去之。若以为彼党果因种族之感情而欲去之，余又可决其无是心也，即彼党欲革君主，亦为主张民主立宪者之常，抑且为其应有之义，此与民族主义有何关系者!”至于满族君主与汉族君主，都是专制政体的统治者，“其为国家之一机关则同，其立于满汉各族之外则同”，这同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个中道理，“民主立宪党多通国史习法理之人，乃谓其并此而不知，决未可也。”[64]杨度不愧是颇懂“帝王之学”的人，他对反满宣传的洞察比学者型的政治活动家梁启超要精明得多。杨度还从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宣传成效中得到启发，

“欲以‘开国会’三字号召于天下”[65]。他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66]

应当指出，对于孙中山等人的“排满革命”宣传，杨度也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知反满民族主义乃实现民主主义之“一手段”，却不知前者同时又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目的。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汪精卫看来，“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67]汪精卫的战友朱执信说得更加妥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何则？其难既已去也。”[68]正因为如此，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首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与1367年朱元璋派兵北上同元朝军队决战时所提出的口号“驱除胡虏，恢复中华”[69]如出一辙。

如果认为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口号仅仅出于策略性的政治动员，认为反满只是政治革命的手段，显然还误解了那些同仇反满的志士们。孙中山等人之所以把那些改造君主专制制度的异曲同工者梁启超等人斥为“汉奸”，并且同投降满洲的明朝大臣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相提并论[70]，就是因为他们胶执着反满民族主义。由孙中山手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还祈求“我汉族列祖列宗神灵默佑相助，使恢复我中华祖国”[71]。及至溥仪退位，清朝皇统结束，孙中山自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之际，他还特意赶往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72]。可谓克始克终。再过7年，当他撰写《建国方略》时，这位民国的缔造者还在津津乐道武昌起义之成功“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73]!

可见，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满足资本家参与政权的政治需要，还不如说是推翻满族贵族统治以及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以汉人为中心的民权政治，挽国家于危亡。如果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国内民族革命的性质，则不啻将近代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硬套中国的辛亥革命，忽略中国辛亥革命的某种特殊性。

顺便指出，自鸦片战争以降，面对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清朝统治者之所以一再反应迟钝，改革的步子之所以那么缓慢，当政者的愚昧颟顸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同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整体格局也不无关系。

还在1903年10月，游美之后宣称告别“共和”的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把近代民族主义分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两类。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74]在这里，梁启超为清朝统治者袒护之意不言而喻，而他对民族主义所作的界定与分类倒不失为有识之言。孙中山等人在宣传反满时诉说“双重奴隶”之苦，要求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推翻“洋人的朝廷”，未尝不同时包含这两个层次的民族主义要求，只是后者不如前者说得那么透彻明了而已。况且，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并非十分圆满和深刻，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存在国内满汉民族矛盾和中外民族矛盾之分。而在中外民族矛盾的两极，既存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这一矛盾层次，又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同中国小农文明与专制主义文明的矛盾层次。即：

民族矛盾
- ①国内：满汉矛盾
- ②中外之间：西方列强同中华民族的矛盾
  - a. 侵略——→反侵略
  - b.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小农文明与专制主义文明

由于国内满汉矛盾的存在，清朝统治者的内心感到空虚和不安，一切以防范和压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且在国内尚称先进的汉民族为主，既分散了督率国人全力对付列强侵略的注意力，以内耗的形式毁坏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资源，而且还以病态的心理对待改革，敷衍塞责，抱残守阙，生怕因改革而大权旁落。这种大敌当前仍忙于防范人民而不是竭力发挥人

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基本国是就只能使中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也正因为国内满汉矛盾的格局明摆着，西方列强往往趁火打劫，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洪杨起义军“奉天讨胡”期间沙俄侵略者大规模地蚕食中国领土以及英法联军乘虚而入。

由于中外民族矛盾又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矛盾层次，问题更形复杂。

第一，矛盾的一极是：西方列强既是被侵略者，又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之先进者，它在发动侵略战争中往往占有军事优势，稳操胜券；矛盾的另一极是：中华民族既是被侵略者，又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落后者，在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军事上的劣势，不堪一击。在国内满汉矛盾制约之下，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作为中华民族的总代表，既然不可能督率国人励精图治，而且不可能真正领导一场全民族保卫家园的反侵略战争，就势必处于既恨侵略者，又惧侵略者；既要战，又怯战；既不甘和谈，又不得不和谈等两难境地，甚至常常出现该和时不和，该战时不战之类停停打打，反复无常的局面[75]，城下之盟就在所难免。

第二，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层次决定了国难当头，救亡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个重要目的。一代代国内有识之士所提供的那些改革方案，所发起的有关改革运动或革命运动，似乎大都象风吹浮萍那样来去匆匆，主要不是基于社会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而稳扎稳打，缺乏相应的社会动员，急就章式的快速跳跃多于平实的社会积累。个中现象，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不可否认和回避的事实，它难免派生出某些不尽人意的历史特征来。

第三，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层次决定了落后的中华民族欲期解决中外民族矛盾的最佳出路只能是“师夷之长技”。而问题在于，中华民族所应同“天、地、君、亲”相提并论而“师”法者却偏偏是中华民族的侵略者，是明火执杖的西方强盗。且不说怎样去“师夷”，至少在要不要“师夷”的问题上，就遇到了巨大的感情障碍，使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于是乎，同封闭保守的小农文明相适应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同无师自通的儒学伦理相适应的泛道德主义在神州大地颇有市场，那些顽固守旧者可以随时获得“爱国”的专利而对那些忧国忧民的“师夷之长技”的发号者与先行者大打出手，随心所欲，甚至一呼百应。在一个巧识“知己知彼”之兵机凡数千年的国度里，民族理性不仅姗姗来迟，而且曲高和寡，“师夷之长技”的历史过程就必然是一个十分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的整体格局下，“师夷”的感情障碍能否清除，社会转型能否迅速和顺利，对外战争的结局能否张扬数千年文明古国之神威，大权在握的清朝统治者的识力、胸怀与气魄就显得至关重要。既然晚清当朝者的个人素质已经远离康熙、雍正、乾隆之辈，而且自道光帝以降，还显得一代不如一代，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的皇朝末世已经到来，那么，“师夷之长技”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毫无疑问，欲期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义无反顾地走“师夷之长技”的理性之路，就必须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变防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为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后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直至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尽管孙中山等人之于反满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深刻，其中的理性分析显得不够，而且还有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情绪掺和其中，泥沙俱下，但反满民族革命的多种合理性及其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我们还不能用今日的民族政策去衡量孙中山一代先驱的民族主义及其反满宣传，因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今日的民族矛盾毕竟已远非晚清时期民族矛盾的那般架式与模样了。已故王亚南先生说得好：“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末，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从而中国传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历史交代，也许是另一个方式，也许还能保持一些官僚政治本身所最需要的形式上的体面。但是，最高统治阶层爱新觉罗王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所以，当时稍有觉悟、稍有时代认识的汉族臣民非到图穷匕见阶段不敢提出任何牵涉到君上至尊大权的政治革新步骤；而在满族则由于怕任何性质的政治革新在这生死关头有利于被支配的汉族而不利于它的统治，是以它一直要等到把专制官僚政治

的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滚开。因此，中国的传统专制官僚政治演变到了清代便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现象：一方面，由于版图、人口的增加，由于一个小的落后民族统治全国之后需要利用以往的一切文化作为其更有效的统治手段，尤其由于经济的日益发展，它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峰；但另一方面，它却是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最不堪收拾的一个。”[76]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等人在实现民族革命之后所能实施的政治革命方案就只能是以推翻传统君主制为前提的民主立宪制，而不可能是梁启超等人在反满民族革命高潮出现以前所期待的君主立宪制，传统的君主制就伴随满汉矛盾的解决，伴随满汉贵族所经营的腐朽皇朝的覆灭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成为清朝覆灭时最古老也最令时人炫目的殉葬品。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孙中山1901年初与罗斯基等的谈话，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5页。

③⑤⑩㉔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221页；第222页；第220页；第221页。

④孙中山1897年8月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⑥孙中山1902年与刘成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7页。

⑦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9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

⑨㉝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5－246页；第254－255页。

⑪《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8页。

⑫梁启超：《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9页。

⑬⑭孙中山1901年春与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谈话的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0页；第211页。

⑮⑯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第251页；第254页。

⑰孙中山1906年7月与芙蓉华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3页。

⑱㉚孙中山1908年11月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第45－46页。

⑲明治38年8月16日神奈川县致内务大臣芳川显正，日本外务省档案秘甲第2047号，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40页。

⑳㉓杨天石译：《孙中山1910年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㉒孙中山1906年9月致苏汉忠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4页。

㉕孙中山1900年8月与横滨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㉖明治33年8月10日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青木外相，日本外务省档案秘甲第308号，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5页。

㉗孙中山1900年7月与宫崎寅藏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7页。

㉘［英］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53页。

㉙《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4页。

㉛孙中山1907年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43－44页。

㉜孙中山1903年12月在檀香山正埠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

㉞㉟㊱㊲㊴㊵㊶㊷㊸㊹㊺㊼㊽㊾㊿(52)(53)(54)(55)(56)(57)(5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第255页；第297页；第261页；第224页；第172页；第296页；第172页；第314页；第172、220、261、443页；第88页；第234页；第237页；第222、317页；第281页；第244、249页；第233页；第259页；第296页；第232、261页；第324页；第259页。

㊳㊻(51)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45－47页；第44页；第144页。

(5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页。

(60)(61)(6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第310－311页；第325页。

(62)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民报》第22号。胡汉民后来在俄国的一次讲演中说：“当时革命的目的，不是仅仅推翻满洲政府，并且在推翻满洲之后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独立的中国。这个意义本来很明白的，但是当时有个弱点，是只提出排满洲的口号，未曾提出打倒帝 国主义的口号，以致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洲政府，便多数都认为民族主义已告成功。在革命军起义和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对外宣言首先承认了满洲政府以前和帝国主义国家订的条约赔的外债。甚至海关收入的支配权，上海混合裁判的法权，更是无条件的送给列强，而成为恶例。这些都是极大的错误，是使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汉民先生在俄讲演录》第1集）胡氏并没有说明辛亥

革命时期革命军有没有能力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有没有能力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在超时空地总结历史教训，故不足为凭。

㊹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00 页。

㊺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 341 页；另见杨度 1907 年 4 月复梁启超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 405 页。

㊻杨度 1907 年 4 月复梁启超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 405 页。

㊼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 1 期。

㊽蛰仲（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 1 期。

㊾《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㊿(71)《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61 页；第 310 页。

(72)《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95 页。

(7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8 页。

(74)《新民丛报》第 38－39 号合刊。

(75)对此，近代民主革命先躯孙中山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海禁初开，动辄与人冲突，冲突之后，斫丧随之。于是，凡百唯随，只求留存体面。久之，则又不可忍，而为第二次冲突。平时虽有外交关系，实未尝有外交手段，故自鸦片之役以来，再战于甲寅，三战于甲申，四战于甲午，五战于庚子，每战必割地赔款，损失权利，而无功可见。中国之对外国，不知外交手段之为患，非不战之为患也。"（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4 卷，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1 页。）

(7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9－160 页。在 1911 年 11 月中旬武昌城内的南北议和会谈中，宋教仁则从共和制即民主立宪制的政治革命要求出发，清晰地说明了种族革命即民族革命同政治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吾辈亦非主张种族革命者，征诸各处独立，满人之投诚者皆被保护之事，即可知吾辈真心。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实有关系，不可不知。因吾辈欲建共和国体，自应推倒政府，政府既为满人，即不得不推翻少数满人。假如此少数满人能明大义，还我国权，自不见有种族革命，且视汉奸亦多被诛乎？明乎此义，自能悉吾辈革命之真心。"（《民立报》1911 年 11 月 20 日）

（作者郭世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 310028）